
王文宏先生訪問紀錄

訪問：陳儀深*

記錄：彭孟濤**

時間：2016年5月2日、6月17日

地點：中研院近史所交誼廳

王文宏先生，1947年2月出生於高雄，為二二八受難者王平水公子。小學時在母親經營的日本料理店目睹蔣孝文的敗行，高三時因作文書寫二二八觸犯當局禁忌，為了避禍搭船前往巴西投靠長兄王瑞霖，並在1966年赴美讀大學前，加入由長兄主持的巴西台獨秘密組織。1970年4月24日，為了阻止蔣經國接班，除有黃文雄、鄭自才在紐約的刺蔣行動外，同時王文宏也在美西單獨策劃刺蔣行動，並與獨盟主席蔡同榮單線聯繫。第一次行動計畫是想在4月19日蔣經國赴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行禮獻花時開槍，第二次是4月27日，擬在蔣氏往洛杉磯聖歐娜佛瑞原子能發電廠參觀時在門口埋伏，兩次刺殺行動都以失敗收場。其後王文宏兄弟為主的巴西台獨組織轉而與史明的獨立台灣會聯繫，成為「台灣獨立革命軍」的一員。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

** 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碩士

2016年4月24日，台北市復興南路後門咖啡舉辦《刺蔣，鎮山》一書（2016，前衛出版）的新書發表會，這是王文宏以張欽泰為筆名，在藍士博、劉承欣等文史工作者協助編排之下的半自傳書寫，有些人名、事件的描述因故有所調整。本篇訪問記錄則是務求全真，冀補該書之不足。

父親是二二八受難者

我的本名是王文宏，在史明的獨立台灣會¹化名為史清台，在《史明回憶錄》²的索引中，可以找到我的真實姓名。我1947年2月出生於高雄鹽埕區，家裡有八個兄弟姊妹，我排行老么。父親王平水開文具行、印刷廠，是二二八受難者，1947年3月6

1 獨立台灣會，1967年在日本東京創立，領導人為史明。該會除主張台灣民族主義，堅持台灣獨立建國外，也是海外台獨團體中，少見的左派台獨組織，強調社會主義。獨立台灣會成立之初，強調以革命鬥爭的路線，推翻當時統治台灣的國民黨政權。1991年由於法務部調查局，宣稱破獲獨台會在台灣的組織，逮捕陳正然、廖偉程、王秀惠、林銀福等人，使獨台會在台灣的知名度大為提昇。1993年史明由海外潛返台灣，將獨立台灣會總部遷回台北，並在高雄、嘉義、台中、台東、新竹等地，陸續成立聯絡處，組織獨立宣傳車隊，透過車隊廣播遊行的方式，宣揚「台灣應該獨立」及「台灣民族主義」的理念。獨立台灣會遷台之後，在政治主張方面，相對和緩，民族資本家及中小企業等，皆成為其運動與爭取的對象。目前獨立台灣會除明白主張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說法係虛構之外，並強調應儘早達成建立台灣共和國，同時推翻中華民國的「殖民體制與特權」。薛化元撰，〈獨立台灣會〉，收於許雪姬等撰文，《台灣歷史辭典》（台北：文建會，2004），頁1265-1266。

2 史明，《史明回憶錄：追求理想不回頭》（台北：前衛，2016）。

日在高雄市政府被國民黨軍隊槍殺。他和日產清查室涂光明³是好朋友。

1947年3月8日，中國軍分別從基隆港和高雄港登陸，但3月6日，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就已經派兵下山鎮壓。當天上午，彭清靠、涂光明、林界⁴等七名代表與彭孟緝談判破裂，涂

3 涂光明（1912-1947），原名涂順義，澎湖白沙打赤崁人，幼年隨祖母來台，初期落脚台南，後遷往高雄。婚後赴上海經商，曾任日軍翻譯。戰後與市長連謀一起回到高雄接收，擔任高雄市政府日產清查室主任。連謀於1946年5月離任後，日產清查室便撤銷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後，涂光明在高雄第一中學召集群眾，成立武裝部隊。3月5日，下午2時又與市長黃仲圖、議長彭清靠，以及范滄榕、曾豐明前往壽山要塞司令部，司令彭孟緝並未接見，但約定隔日再行談判。3月6日上午9時，除昨日一行人外，苓雅區長林界、台電高雄辦事處主任李佛績也一同前往。談判代表抵達要塞司令部後，被安排在會客室，待涂光明等7人坐定後，彭孟緝才進入與市長談判和平條款，但遭彭孟緝斷然拒絕，並拍桌怒罵，大呼來人。據彭孟緝所言涂光明見狀自知難以脫困，遂拔出暗藏在西裝上衣內之手槍，彭的副官劉安德自後撲身，予以制止，室外官兵聞聲而入，將代表一一搜身，涂、范、曾3人被捕外，其餘人等在衛兵監視下枯坐原處。但據當時在談判現場的李佛績事後回憶，涂光明從頭到尾未發一語，更未見到涂光明拔槍。由於彭孟緝已決心派兵鎮壓，約定談判不過是緩兵之計，故一面將談判代表扣留，另一方面出兵「綏靖」。3月7日，彭孟緝救平高雄後，除向陳儀解釋用兵原因外，並允請槍決涂光明、范滄榕、曾豐明3人，警總立刻覆電，允許槍決主犯。涂光明等人因此成為二二八事件中的犧牲者。朱彥碩撰，〈涂光明〉，收於張炎憲主編，《二二八事件辭典》（台北縣新店市：國史館，2008），頁325-326。

4 林界（1910.3-1947.3），高雄市苓仔寮人。公學校畢業後，與兄弟一同在高雄市的新和鐵工廠擔任師傅。1939年，奉派到台東都蘭之東台合資會社糖廠擔任工務主任。1940年返回高雄與兄弟合資開設黑板組織工廠。戰後轉投資碾米廠，並擔任台灣省技術顧問團顧問。1946年8月，出任《台灣新生報》印刷廠廠長兼印報廠廠長。是年11月，出馬角逐第一

光明、曾豐明、范滄榕遭逮捕隔天槍決，彭明敏的父親彭清靠、黃仲圖等人被扣留凌虐，而林黎彩的父親（廖中山的丈人）林界先生則於3月23日在高雄要塞司令部被槍決，可以說七名談判代表的下場都不一樣。照長我十四歲的大哥的說法，涂光明有台獨思想，他可能也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，因為涂光明隨身配槍，那時只有從中國大陸來的情報人員才能配槍。

我阿公王風在日治時代，於1928年4月3日召集高雄台灣鐵工廠工人160人及淺野洋灰工廠等各單位工人，一共六百餘人，組成「台灣機械工友會」，王風被推舉為會長。因成立工會，王風被廠方革職，導致1928年4月7日工人開始罷工，全島農工團體響應，總共1443人參加，造成日治時代的第一次大罷工。⁵照我母親和大哥的說法，阿公當時擁有好幾棟樓房，畢

屆高雄市連雅區（今苓雅區）區長選舉，獲得當選。1947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，當時，林界正以技術顧問團顧問在屏東訪問，聞變立即趕回高雄。3月3日，高雄發生民眾在街頭遭到槍殺事件，衝突一觸即發，為因應變局，高雄市參議會決議成立處理委員會，並要求駐紮在壽山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緝下令解除巡邏隊的職務，以停止濫殺民眾之行為。3月6日，高雄市長黃仲圖乃邀林界，與議長彭清靠及涂光明、曾豐明等人赴高雄要塞陳情，不料卻在過程中突遭逮捕，其中只有市長黃仲圖與議長彭清靠獲釋。3月23日（另一說3月21日），林界被槍決，得年僅37歲，事後，家人在要塞前瓦礫堆中挖掘出屍體。1992年2月，林界之女林黎彩曾連續向法院控告彭孟緝「非法處決林界先生」、「偽造文書」、「妨害名譽」，最後皆以不起訴結案。莊天賜撰，〈林界〉，收於張炎憲主編，《二二八事件辭典》，頁230。

5 台灣鐵工廠位於高雄市，該廠職工王風於1928年4月3日組織台灣機械工友會，被推為會長。鐵工廠以事業不振為由，於4月4日解僱王風。5日工友會代表郭清、陳良等人訪問工廠廠長詢問解僱王風的理由，並要求王風復職、承認工友會、解僱職工應預先告知等事項，但鐵工廠全部拒絕。6日百餘名職工斷然進行總辭。工友會向各友誼團體報告此

竟擔任工會會長，也要有點財產才行。大罷工結束後，日本警察要抓人，他就帶著我父親流亡到中國。史明的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⁶有提過我家三代的事情，說我阿公反日本帝國主義，我父親反日本帝國主義和反中國國民黨，到我這代也反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。

和很多二二八的遺族相比，我家的處境算不錯的，除生活無虞外，父親的屍體也有找到。聽大哥說，當時楊金虎來通報父親死在市政府。祖父和大哥在愛河橋州廳附近，找到數輛牛車的屍體車隊，準備要運往覆鼎金埋葬，祖父就拿錢去跟領頭士兵買屍體，然後用拖板車把屍體運回家中買棺出葬。我記得母親說，後來撿骨時，有撿到父親的印章，當初認屍時，大哥是從父親手上的特徵認出來的，因為臉部變型而且都沾滿血漬，已經難以辨認了。記得母親說，父親是個很體面瀟灑的人，出外都西裝筆挺，但當時西裝、手錶、皮鞋都被扒光。而且子彈是從胸前進入，後面出來，所以後背有一大洞。

二二八事件期間，有很多學生、青年在街頭被打死，當時風聲鶴唳，即使自己的子女死在街頭，父母也都噤聲，不敢張揚，

事始末，要求支援。結果農民組合、台北機械工會、文化協會等加入支援，並以工友會名義向鐵工廠提出諸項要求。對此，鐵工廠方面決定全員解僱。文化協會、農民組合則向全島發出檄文，進行罷工救援、同情演講，22日更進行全島罷工，罷工之職工數達1,433人。工友會除了想提出罷工中的工資請求及其他請求訴訟，另一方面亦計畫由罷工職工自營鐵工廠。但約半數的罷工職工已回到故鄉務農或轉業，到6月8日除了有8名復職者外，罷工的職工已經四散，爭議終歸自然消滅。蔡龍保撰，〈台灣鐵工廠罷工事件〉，收於許雪姬等撰文，《台灣歷史辭典》，頁1179-1180。

6 史明編著，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（台北：草根文化，1998）。

在家中這種話題也成爲禁忌。照我大哥的說法，當時屍體都載到覆鼎金⁷，隨便挖個亂葬坑就埋了。

1947年3月6日下午，當彭孟緝的部隊下山鎮壓時，士兵手持衝鋒槍，隨在架有機關槍的吉普車之後，見人就殺，甚至搶劫商家。高雄市政府內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正在開會，二樓的反抗群眾有一挺舊日軍機關槍，但爲什麼無法使用？我猜想，可能是因爲國民黨的特務混入二二八處理委員會，事先把機關槍破壞掉了，所以高雄市政府根本無力抵抗，反而在高雄車站和雄中比較有反抗，像我初中念雄中，雄中司令台那邊就有彈孔，我記得小時候我在五福四路家裡二樓外牆也有看過彈孔。總之，當時我還是嬰兒，沒有親身經歷，所以有關二二八事件，大都是聽我大哥描述的。

日本料理店目睹蔣孝文的劣行

1954年我小學就讀高雄忠孝國民學校（今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小）⁸，1959年初中念省立高雄中學，1962年高中念私立高雄

7 覆鼎金是位於高雄市三民區的一個地名，廣義上泛指現今明誠路以北的三民區境內，其邊界與相鄰聚落大致上如下：東爲烏松區，西爲左營區，南隔明誠路與灣仔內相望，北則爲仁武區。現今行政區劃爲高雄市三民區鼎金里、鼎盛里、鼎強里、鼎力里、鼎西里、鼎中里、鼎泰里等七個里。〈覆鼎金〉，「維基百科」：https://zh.wikipedia.org/wiki/%E8%A6%86%E9%BC%8E%E9%87%91#cite_ref-multiple_1-9，點閱日期：2016年10月31日。

8 位於高雄市鹽埕區大智路71號，1952年9月20日創立。1968年8月1

道明中學。我初中時喜歡柔道，和各中學的柔道學友組成小組合，還跟左營眷村的小混混幹過幾次架。和眷村的混混打架，與二二八的情結無關。坦白說，在我離開台灣之前，其實對二二八根本不了解。我長到十八歲真的不知道什麼是二二八，教科書上沒有、小說上也沒見過，雖然小時候聽過家人說「你父親在二二八被壞人打死」，但父親的往事和死因是家中的禁忌，每次問起家裡大人全是說「囡仔人有耳無嘴」，這是真實的反應，所以我從小很納悶，九九乘法明明是「二二四」，怎會變成「二二八」呢？

父親因爲在二二八遇害，所以我從小是由經營日本料理店的母親撫養長大的。母親的「真好味」日本料理店座落在鹽埕區大仁路的繁華地段，那間店本來是我舅舅跟人家合開的，但二二八事件後，舅舅逃到日本，母親就把那間店買下來經營，因爲母親很會做生意的關係，「真好味」當時可能是南台灣最大的日本料理店，而母親也靠著這家店，養活一家12口人。據我所知，以二二八的遺孀來說，除非本身家境富裕，否則大部分的下場都是悲劇，但我母親算是例外。

在母親的店裡，讓我印象最深的，莫過於親眼目睹蔣孝文的敗行。1956年夏天我小學三年級時，有一天我在料理店的餐桌上寫著功課，突然聽到「嘍」的一聲，一輛吉普車衝到騎樓外緊急剎車停下，後座的衛兵腰邊配著白色帆布槍套、套內插著一把

日改名爲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民小學。2010年12月15日高雄縣高雄市完成縣市合併，校名爲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民小學。〈校史及沿革〉，「高雄市鹽埕區忠孝國小」：<http://163.32.192.1/modules/tinyd02/#A>，點閱日期：2016年11月1日。

手槍，先行下車。料理店的女服務生帶他到樓上榻榻米座，他快速巡視一下，就下樓恭請前座開車的人。開車的人高大英俊，右腰旁配著一把黑色手槍、套在棕色的刻花牛皮槍套，就像西部電影牛仔那樣。當時我不知道他是誰，後來才知道原來是蔣介石的「金孫」蔣孝文。

這天之後，差不多每個禮拜都能看到蔣孝文的到來，直到1956年底，突然就沒再見到他的蹤影。蔣孝文最喜歡在樓上那間榻榻米的房間，後來聽說，他操著字正腔圓的「台北國語」，和我們南部的「台灣國語」不同，不但言語粗魯三字經不離口，還會伸出「鹹豬手」，騷擾所帶的舞女。1956年蔣孝文沒經過考試就來讀陸軍官校，晚睡晚起，還嫌餐點不好吃，經常蹺課也不出操，開著校長的吉普車、配著私槍，帶著隨扈到處亂竄。年底在高雄市第一舞廳和人爭奪紅牌舞女開槍鬧事，還毆打、訓斥到場處理的警總、憲兵、警察等情治人員。事情鬧得太大，1957年被陸軍官校開除，蔣經國只好下令教育部特設法條，將蔣孝文送去美國舊金山避風頭。是誰給一個平民可以配私槍到處耀武揚威的特權？是哪個「清廉的公務員」能讓兒子到處揮霍、玩女人？是哪個人有那麼大的權力，可以使國家的軍校屈服在他的淫威之下？誰正在培養蔣家第三代接班人？而這些也是我們面對國民黨所塑造的「偉人」假象時，可以思考、檢視的問題。

國民黨從1946年推行「國語運動」⁹，學生在學校被聽到講母

9 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台灣之後，隔月即開始籌設「台灣省國語推行委員會」，並於1946年4月2日正式成立。首先頒佈標準「國音」，同時於各縣市設立「國語推行所」、講習班，積極推展國語運動。這裡所謂的國語，有別於日本時代的「國語」（日語），指的是中國的北京話。此

語會受罰，並且鼓勵學生向導師檢舉誰講母語。當時我在學校只和老師說北京話，和同學都講福佬話，所以經常被別班同學告密，雖然沒有被罰錢，但脖子上要掛著「要講國語」的牌子，然後被捉到朝會的升旗台上，面對數百位小學生。我常自問，為什麼蔣家國民黨政權要消滅台灣母語？為什麼蔣家國民黨政權扭曲小孩的人性去學習檢舉、告密？這些話也許是事後的批判，但從很小的時候我就沒有這種逆來順受的思想，對於不正義的事絕不低頭，所以當時遇到這種在升旗台上的羞辱，多數同學都會低著頭，只有我和少數同學會昂首面對。

高中作文惹禍上身

1965年初，離高中畢業前五個月，國文作文課出了「我的父親」這個題目，事後我回想起來，才發現這可能是蔣家國民黨為了探你的家世，但當時我還年輕，沒有想太多，就如實地寫說「我的父親在二二八被壞人槍殺了」，沒想到這句話出了大問題，隔天就被老師叫去辦公室問話，當時老師指著那句，問我「什麼是二二八？」、「誰是壞人？」，我回答說：「從小阿公、阿

後，國語的推行主要是透過教育體系來進行，例如1951年7月教育廳命令各級學校應以國語教學，嚴禁方言；聘請教員時，應考慮其國語程度。此後又頒佈一連串的行政命令或施行辦法，強力推行國語政策，同時禁止使用「方言」，而所謂的「方言」，則是包括台灣本地的閩南語、客家語及各種原住民語言等。因此「推行國語」其實是和「禁止方言」同步進行的。遠流台灣館編著，《台灣史小事典》（台北：遠流，2000），頁161。

嬖和阿姑、阿姨就這樣告訴我」。隔天，我被叫到教官辦公室，教官、訓導主任、國文老師、班導師四個人圍著我逼問同樣的問題，我也是這麼回答。

我覺得情況不尋常，下課後回家馬上告訴母親這件事，母親聽完馬上叫二哥騎摩托車請「黃先生」來店裡。那位「黃先生」是調查局派駐在果菜批發市場的某主任，下班經常來店裡坐坐。警備總部的胡先生也來了。隔幾天晚上，教官穿著便衣和訓導主任一起來店裡，黃先生的同事、警總長官也來了，十二人座的圓桌除了母親、二哥外，全是蔣家特務，不只請客吃飯，散席後還要送禮加紅包，這才讓事件平息下來。

國民黨的貪污腐敗，到了讓人髮指的地步，母親的日本料理店，從來沒發生過黑道來鬧事、敲詐的事情，倒是警察、衛生局、警總、調查局、稅捐處等等，在每年的農曆年、端午節和中秋節三大節日，給他們的禮盒裡面，都要加藏大紅包。我在家裡排行最小，當時經常要代表母親去「送紅包場」。這些年節固定的送禮和紅包，母親還能預料要「進貢」多少，但是三不五時，督察、台北的長官或某個官員，帶著名片到店裡，母親也得陪著笑臉，分文不取，任由他們白吃白喝。

十八歲離開台灣

作文事件隔沒多久，有一天晚上母親對我說，我們是黑名單家庭，你又在作文上寫二二八闖了禍，現在事情暫時壓下來，但將來你當兵難保不會被探出來，所以要我離開台灣，到巴西投靠

大哥。

母親與我夜談隔日，就派店裡會計開始申請出國證件，第一關是申請戶口謄本和良民證；第二關是出境證，第三關是護照，第四關是巴西簽證，關關都是欠東風過不了的難關，缺一不可。

1965年我18歲，已屆兵役年齡，怎麼能拿到警備總部的出境證呢？我向戶政事務所申請的戶籍謄本，一個星期就拿到；向警察局申請的良民證，一般是二、三星期才知准不准，但是一個紅包，十天就下來了。再來向台北警備總司令部申請的出境證於二星期後被駁回，理由是「台端已屆兵役年齡，所請不准」；當晚母親和我帶著一盒禮品加紅包、一簍紅蟳，去到警總胡先生長官的宿舍，請教出境證役齡的問題，這位長官就拿出兵役法規的書本，指出「役男屆役年之翌年後，不得出境」條款，這個文字遊戲老百姓是看不懂的，白話文的意思就是「滿18歲的役男，在明年1月1日前，可以出境」。於是，我重新申請出境證，附上兵役法規的役齡條款，於三星期後收到警總的出境證。巴西大兄的依親證件也已寄到，後續的護照和巴西簽證也在1965年5月中順利獲得。

6月高三畢業考完，我就離開台灣了，等於還沒拿到正式的畢業證書，我就先離開了，當時我在航向巴西的船上，說我已經18歲，沒有人相信，都認為我騙人，因為一般人的認知是，男生16歲因為兵役問題就不能出國了。

從前到巴西，是透過日本的農業移民計畫，包括大哥1963年移民巴西，也是先在日本獲得移民簽證，才從橫濱港搭移民船前往巴西。他在日本公司修理相機。當時除了專業人士以外，大多數的新台僑都投入兩種行業，一是「提包客」，二是「跑單幫

客」，那時巴西對東方的貨物很有興趣。

當時到巴西的貨客船路線大同小異，差別只在停泊的港口不同。我從基隆出發，經香港(Hong Kong)、新加坡(Singapore)、模里西斯(Mauritius)、南非的伊莉莎白港(Port Elizabeth)和開普敦(Cape Town)，再一路西行到巴西，前後歷經兩個月，1965年9月到達巴西。開普敦開往巴西的途中，因為會接近赤道，所以船上還舉辦赤道祭(Equator Festival)來慶祝，那天在後甲板中央架了舞台和音響，船長向旅客致歡迎詞後，就開始赤道祭表演，大家玩得不亦樂乎。那時我十八歲，船上其他小孩年紀都比我小，所以我等於是「囡仔頭」。

航行途中，還有許多有趣的見聞。馬六甲(Malacca)、新加坡(Singapore)、檳榔嶼(Penang Georgetown)及附近諸小島，在二次大戰前是英國殖民地；1946年4月，新加坡成為英國直屬殖民地，後來併入馬來亞聯邦，1957年8月馬來亞聯邦從英國獨立出來；1963年新加坡加入馬來西亞成為一州，號稱「星洲」；新加坡位於馬來半島(Malay Peninsula)南尖端，介於南中國海和馬六甲海峽(Strait of Malacca)交界處，是海洋貿易的重鎮；1965年8月9日，新加坡脫離馬來西亞獨立建國。我乘坐的大船，於1965年7月初到達新加坡，大船清晨停在新加坡港中沒有靠岸，海關檢查、旅客上下、貨物吊卸，進行的模式和香港一樣。從香港上船的旅客，午後大多在新加坡下船，不是在新加坡下船的旅客，不准當天上岸。從大船上遠望新加坡，一片高樓大廈，和香港相似，但樓層沒那麼高，也沒有那麼密。我們第二天早晨，乘第一班小交通船上岸，再僱用碼頭邊的三輪車，前往新加坡的中國城(China Town)——牛車水。大船在新加坡

上下貨物停留了三天，剛好也是新加坡限水期間，上街洗手、上廁所有些不便。星洲的清水大多是向馬來西亞購買進口，限水已有一段時日，這可能是馬來西亞對新加坡獨立自主的唯一懲罰手段。新加坡市面太平，沒有槍砲滿街、戰爭欲來的感覺；唯一看到拿槍的場景，是頭纏毛巾的印度錫克族警衛，手持散彈槍侍立在銀行大門外。我們有幸遇到一個亞洲國家獨立自主的前夕。

我在船上，遇見一對從香港上船的華裔模里西斯夫婦，經常講「我們模里西斯人」，而不是講「我們中國人」，過去的教育都教我們，華人後裔就是中國人。我深深體會到，華人的後裔，不一定是中國人，這帶給我很大的衝擊。

包括後來我到巴西、美國，那裡的華人都有落地生根的精神，和早期來台灣的先民一樣，鄭成功、清朝時代來台灣的漢人多為單身男性，他們想成家立業，只能與台灣平埔族女人通婚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唐山公，平埔嬖」。我在巴西、美國，深深感受到華人移民是要融入那個社會，反觀國民黨在台灣的做法，卻是把這些既得利益者，劃分出來變成高高在上的「高級外省人」。我也是受國民黨教育長大，但在船上的所見所聞，以及日後的種種經驗，造成我的思想轉變敢於反抗不公不義，尤其是我有在思考，有些人卻沒在思考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船上有位陳老師會在餐後講古，我經常去聆聽，他雖然都講如鴨母王朱一貴等歷史故事，以及「乞丐趕廟公」、「豬去狗來，狗去豬又來」等民間俚語，但對我來說，是完全新鮮的東西。

加入台獨組織

離開台灣前，母親就要我到美國讀書，當時我高中畢業，對我來說，葡萄牙語是完全陌生的語言，英文至少有讀過，所以到美國念書，可說是離開台灣前就預定好的目標。我到巴西後，發現聖保羅（São Paulo）比台灣還繁榮進步。1966年7月到美國洛杉磯的羅耀拉私立大學（Loyola University）念電子科系，因為後來都在為台獨運動奔走，所以大學念了六年，1972年才畢業。

1966年7月啓程前往美國讀大學前，我受到大哥王瑞霖台獨思想的啓蒙，加入以我大哥為首的巴西台獨秘密組織「台灣同盟會」。1968年3月母親來美國探望，我陪母親一起回巴西。4月，我從巴西返美前，和大哥取得共識，為了保密，巴西的台獨組織獨自發展，和日本「台灣青年獨立聯盟」、「獨立台灣會」，以及美國的「全美台灣獨立聯盟」（The United Formosans in America for Independence，簡稱UFAI）保持平行的聯絡。1969年，以吳彩瑜和周叔夜為首的巴西台獨組織，加入世界台灣獨立聯盟，成為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支部。

1967年我在洛杉磯，跟「全美台灣獨立聯盟」組織部幹部賴文雄¹⁰認識。1969年9月，我與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的新任主席蔡同榮初次見面，他邀請我加入台灣獨立聯盟，我也爽快答應，屬於「島內工作組」秘密盟員，直接和主席單線聯絡。蔡同榮1967年在美國南加州大學（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）念書

10 賴文雄（1933-2012），1933年生於台中，美國西雅圖華盛頓大學博士。首任全美台灣獨立聯盟組織部長。1992年從紐約返台，曾任民進黨籍海外僑選國大代表、大屯有線電視公司董事長、美商穩菜公司總監等職務。

時，我還不認識他。

陳榮成放我鴿子

關於1970年4月刺殺蔣經國的行動，其實西海岸和東海岸之間沒有聯繫，而且我之所以籌畫刺蔣，有人說是為了報仇，可能在我的潛意識中，也確實存在這種想法，但坦白說，主要的原因，是阻止蔣經國接班與蔣介石的家天下。1970年2月，蔡同榮要我先去紐奧良機場（New Orleans Airport），但我在機門旁等了一段時間，蔡同榮約好的陳榮成卻沒來接我，後來蔡同榮又要我去那契托什（Natchitoches）的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（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）校園等陳榮成，但都已經講好了，他卻遲遲沒現身。陳榮成和我從來不提這段往事，他只說他負責把槍枝移交給鄭自才，但否認事前知情刺蔣案，他之前被聯盟派到巴西，其實就是要尋找槍手。¹¹

11 陳榮成就四二四事件，對外首度接受訪問時的說法是：「我深信蔣家政權必亡，但何時才能實現呢？我亦認為不能只是紙上談兵，一定要有實際行動。剛好我所任教的大學裡有一位當過越南特工隊士官長，他常在課餘談起他在越南如何訓練游擊隊…，但是有教練，誰來執行呢？來美的留學生都是中規中矩的斯文人，我自己則是黑名單人物，動彈不得；左思右想，最後我決定先購買兩支手槍以作為訓練的工具，至於槍手，我則被建議到巴西尋找。…那時候，當得知蔣經國要來美國的消息，蔡同榮主席曾打電話給我，商談與暗示我們需要有所行動，但是我認為一切尚未就緒而堅決反對；經過一段時間，鄭自才提出他要負責一部分海外聯絡部的工作，要我辦理移交，於是我交出一些文件與槍枝、子彈；我確實不知道，4月24日他們決定倉促行事。」見陳榮成，《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內情：1970四二四紐約刺蔣案》（台北：前衛，2015），頁158。

陳榮成最近出了一本《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內情：1970 四二四紐約刺蔣案》¹²，封面上印有一把槍，那是一把用「點三八」(.380 caliber bullet)子彈的左輪手槍，四二四¹³用的是貝瑞達(Beretta)「點二五」半自動的手槍，兩者完全不一樣。當年鄭自才當然不希望陳榮成出庭作證，因為鄭自才的律師認為，美國很多人合法擁槍，攜槍越州也不是什麼大事，只要陳榮成不出庭作證槍的來源去處，鄭自才可能罰款了事，然後陳榮成躲避幾天就會沒事了；但每個人的考慮不同，陳榮成最終還是出庭作證是他把槍枝交給鄭自才。

刺蔣行動功敗垂成

在那契托什等了三天後，我到紐約機場和蔡同榮見面，他

12 陳榮成，《我所知的四二四事件內情：1970 四二四紐約刺蔣案》(台北：前衛，2015)。事實上陳榮成先前已曾受訪，參見陳儀深訪問，林東璟、簡佳慧記錄，〈陳榮成先生訪問紀錄〉，陳儀深訪問，林東璟等記錄，《海外台獨運動相關人物口述史(續篇)》(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2012)，頁299-314。

13 1970年4月24日屬於美國台灣獨立聯盟的黃文雄及鄭自才兩人，為抗議國民黨政府在台灣的統治，計畫對當時訪美的行政院副院長蔣經國採取暗殺行動。他們原定趁蔣經國預定出席美東工商協進會舉行午餐會之時，由黃文雄負責開槍行刺。但行刺之時，因美方安全人員阻止，槍擊未中，是謂四二四事件。黃文雄及鄭自才被捕後，先經台灣同鄉會協助交保，後又棄保逃亡。在黑名單陸續開放之後，黃文雄並且成為海外黑名單的最後一人，而其偷渡返台也宣告海外黑名單的終結。薛化元撰，〈四二四事件〉，收錄於許雪姬等撰，《台灣歷史辭典》，頁238。

說本來陳榮成要主持這個計畫，但他臨時改變主意，當時我回說，將來我會獨自進行刺蔣行動，我還說：「除了你之外，不要讓其他盟員知道我的計畫。」當時我計畫在美東、美西都要準備行動，雖然蔣經國詳細的行程不清楚，但就我所得到的資訊是，蔣經國來美國訪問，美東、美西他都會去。當時我根本不知道蔣經國會下榻在哪個紐約飯店，所以還在第五街附近幾家飯店喝咖啡，大廳、前門、後門走走看看。當時我還去找賴文雄，因為和其他盟員相比，我年紀最小，所以他問：「囡仔，你來這裡做什麼？」我說：「我來玩啊！」他請我吃飯，在談話中，他也知道我想幹什麼。

當時蔡同榮告訴我蔣經國的行程是4月18日到達洛杉磯，4月19日上午11時在華埠孫中山銅像前行禮獻花，所以我計畫在那裡行刺。我本來的計畫是，要從距離銅像不遠處的樓房上以長槍狙擊。當時行動者有兩位，一位是擔任刺客的我，另一位是女性幫手，當我的司機。我來美國不久，大概1967年就開始練習長、短槍。當時我還安排幫手放鞭炮，準備趁著鞭炮響起時，探頭出來瞄準射擊。只不過，蔣經國後來沒有出現。任何人的行程都有可能變化，但當時完全是靠電話聯絡，不像現在有手機，可以隨時聯繫，所以很不方便，有任何變動，也沒辦法即時掌握。「鎮山」就是當時刺殺小蔣的代號。

刺蔣行動還有一次，後來我得到的資訊是，蔣經國先到洛杉磯，再到紐約，紐約的行程結束後又會回到洛杉磯，而且4月27日蔣經國將來參觀聖歐娜佛瑞原子能發電廠(San Onofre Nuclear Generating Station)。通常行刺的方式有兩種，一種是用短槍近身攻擊，但下場不是被逮捕，就是被當場打死，這是很現

實的事情，所以用短槍的，都是準備要犧牲的。至於用長槍射擊的，因為行動後可能還有機會逃脫，而我當時的計畫，就是準備刺殺後逃脫，那裡離墨西哥也不遠，我打算一射擊完，就沿著公路逃往墨西哥。當時幫我的都是中南美的人，加上我對那裡的路也很熟，所以我有把握，脫離現場不成問題。包括在華埠時也一樣，那附近也有高速公路，所以要脫逃也不困難。

我準備用來行刺的槍枝，不論長槍、短槍，都是黑槍。一把雷明頓 740 半自動長槍，附加 6 倍光學瞄準鏡，配上五顆「點三零零六」子彈的彈匣，另加兩個裝滿子彈的備用彈匣，藏在四呎長的日光燈紙箱裏面；一把毛瑟 635 手槍配備八顆「點二五」子彈的彈匣，隱藏插在右腳襪子裏，槍柄綁了一條釣魚線，另一頭綁在右內褲袋左側的拉鍊上，萬一被搜身內褲袋裏找不到手槍，這樣站著、坐著都能把右手伸進右內褲袋、拉開拉鍊扯起腳襪子內的手槍，左腳襪子裏藏了一個裝滿子彈的備用彈匣。

陳榮成提供給鄭自才的槍是有編號的，我認為他犯了兩個錯誤，第一是不該使用有登記的槍枝，第二是沒用砂輪把編號磨掉。有人質問我，就算編號磨掉還是檢查得出來，但這是隨便說說的外行話，以現在的雷射技術來說，雖然有辦法查得出來，但 46 年前就沒那種技術了。鄭自才以為陳榮成的兩把手槍是沒登記的黑槍，所以沒把槍枝編號磨掉。那兩把手槍，一把是「點二二」，另一把是「點二五」，其中「點二五」的火力比較強，但必須近身攻擊才能致死。

四二四當時，黃文雄在距離蔣經國一兩公尺處開槍，但因持槍的右手被便衣員警托高，所以子彈從蔣經國的頭上飛過，後來黃文雄又開第二槍，卻失卻準頭，黃文雄隨既被三、四位美國便

衣員警撲倒壓制，蔣經國隨處四處竄逃，黃文雄仰頭大喊「Let me stand up like a Taiwanese! 讓我像台灣男子漢地站起來！」。鄭自才見狀從隱身大門旁衝上平臺，被美國便衣員警擊倒，左額受傷流血。兩人被押往警察局，然後送往紐約監獄監禁。

事後來看，要是四二四用的是口徑較大的黑槍，局面說不定會完全不同，只是當時他們 4 月才拿到槍，時間太匆促，不像我們有半年的時間準備。如果蔣經國 4 月 19 日在洛杉磯華埠孫中山銅像前出現，按照我的計畫，成功的機率非常高。因為我是用長槍射擊，而且練習已久，到後來自製子彈，根據距離多遠，需要多少火藥，以及彈頭的重量多少，都有公式可以計算，所以很準的，一百公尺內蔣經國絕對躲不了的。

四二四當天，蔡同榮開車載鄭自才、黃文雄和黃晴美到紐約廣場飯店 (Plaza Hotel) 前的噴水池旁下車，黃文雄是黃晴美的大兄，黃晴美是鄭自才的太太；蔡同榮開車去找停車位，但很晚才回來；賴文雄、黃晴美和黃文雄從飯店後面小巷橫向走到五十八街，再回走到廣場飯店。黃文雄向右沿著飯店走廊趕往旋轉大門，同時蔣經國的車隊已經到了飯店前的車道開始下車，蔣經國步上台階，走向旋轉門前的平台，台階和平台兩側各有美國便衣員警，黃文雄趕到時，蔣經國正準備踏進旋轉門，但還是沒能得手。

4 月 27 日，我們預估蔣經國會坐在第二輛車司機的後座，因為一般來說，第一輛車是前導車，主角通常會坐在第二輛車司機的後座，至於第三、四輛車則是護衛，所以當時我把廂型車停在發電廠附近，後車窗朝向崗哨，取出長槍，並把長方桌調整好位置，就坐在小凳子上靜靜等待，準備狙擊。原本車隊應該在發

電廠崗哨前停車安檢，但四二四之後，情況不同了，當時車隊突然出現，沒有減速就直接進入電廠，所以我完全沒有機會刺殺。

關於 1970 年 4 月我的刺蔣計劃，鄭自才也是保釋事後才知道的，當時我去紐約，有稍微向他透露，但沒有講得很清楚。1971 年 5 月中，紐約法庭宣判刺蔣案之前，鄭自才向我請求協助，說他準備逃亡外國，於是我就安排護照借給他使用。

美西刺蔣計畫失敗後，鄭自才和黃文雄保釋金與台獨聯盟路線的爭議，巴西台灣同盟會決定不再和世界台灣獨立聯盟合作，轉為積極和日本獨立台灣會史明聯繫，等於隸屬於史明的台灣獨立革命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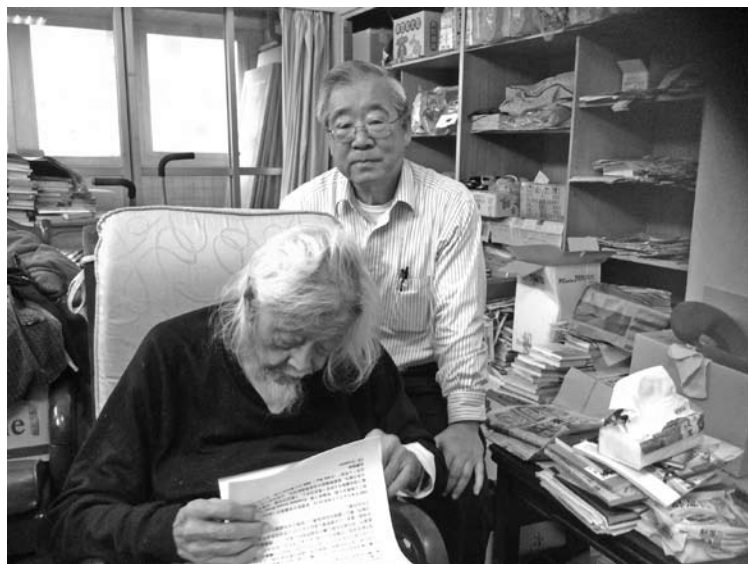
初次與史明前輩見面

1971 年 6 月 26 日，我幫忙鄭自才離開美國前往瑞典尋求政治庇護。黃、鄭兩位志士離開美國之後，史明認為我雖然和他聯絡數年，書信和電話總有不足之處，希望我去日本和他見面。

1971 年秋天，我到達東京羽田機場後，乘坐單軌電車（Monorail）到終站，史明已在站內等我，當年他 53 歲我 24 歲，他人比一般日本人高大，我又穿著約定的服裝和肩背著約定的行李包，一下子就相認了；隨即轉乘 JR 山手線（Yamanote-sen）到池袋站西口（Nishi-Ikebukuro），步行不到七分鐘就到史明的「新珍味中華料理店」。記得當時，史明套上白色的廚師袍，親手做了一碗他拿手的大滷麵、和一盤煎餃，滋味道地，這是他在中國華北學到的手藝。當時日本景氣不錯，這個三角窗料理店生意興隆，樓下、二樓、三樓經常滿座。晚上 11 時多，還

清台同志，您好！
最近日子已近，感到為了一些「
能主台灣會」，「T.K.I.」(K.I.工作)的系列活
動，
「台灣革命」，這是以暴力打擊上完成前
打斷台灣大地的民族意識，現在則進入了
以公開民主鬥爭和地下組織大眾(國賊人名單
我方名單)的階級鬥爭，這有一場艱苦的鬥爭，
才能完成革命任務。
然而，在民主鬥爭方面，由主力的民族黨成份
複雜，個人自由和選擇，所以呈現出混亂狀態，雖
進而不可結果，仍奉使之克仍也維持上分。

史明當年給清台的信



王文宏和史明老先生

有客人小飲、宵夜。

新珍味四樓是史明的書房和臥房。我住在離「新珍味料理店」20多分鐘地下鐵車程的大樓公寓，早上11時到達新珍味直接上四樓，史明停下他的《台灣人四百年史》漢文版寫作，開始一對一上課。內容是荷蘭、西班牙、東寧鄭氏王朝、大清帝國、日本帝國、蔣家國民黨政權的台灣四百年外來殖民統治、台灣人民要求出頭天的血淚抗爭歷史、台灣民族主義的形成等；其中也談到資本主義、社會主義、民主主義、民族主義等。就是史明所說的台獨志工的台灣歷史的學習，和思想的整理。

下午1時和晚上7時左右，就一起到新珍味二樓或附近的日本、韓國料理店吃中飯和晚飯。飯後不久又開始上課一、二個小時，大概我每天都要學習五、六個小時。每二、三天下午，史明會去游泳池游泳，有時我會跟著去；沒跟史明去游泳時，就經常去秋葉原（Akihabara）找新電子產品。

這次在日本二個多月向史桑學習，見到幾位台灣和日本的同志，也曾經和傳奇人物台風與萬華12生肖幫大哥老鼠同桌暢談，也是人生一大快事。往後數年，我每年都會去東京向史桑請益學習。

蔣經國吐血而亡

蔣經國雖在1970年4月24日在美國紐約市倖免於難，但也

不得善終，據很多人的說法，後來他是吐血而亡。¹⁴我記得1980年代在美國，曾看過「新約教會」的文宣，他們宣稱長期受到蔣經國的壓迫，所以詛咒說，上帝將給蔣經國制裁，他死時必七孔流血。

蔣經國的原子武器秘密計畫是：1970年代先以學術研究製作原子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為名，向南非購買天然鈾，向加拿大購買一座小型重水原子反應爐，安裝在桃園龍潭的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，自建重水加工廠（在提鍊濃縮鈾時，重水用於鈾燃燒時降溫）。以表面進行製造鈾燃料棒為幌子，讓美國和國際原子能委員會監督；暗中另自建一座鈾化學分離廠，從鈾中淬取鈾（Plutonium），作為原子彈核子連鎖分裂材料。這樣同時可以「偷樑換柱」，把正式管道購買的核能發電廠的鈾燃料棒，濃縮收集鈾以便製造原子彈。蔣經國這個「明修棧道（製作鈾燃料棒），暗渡陳倉（製造原子彈）」的極機密計畫，就與核一、核二和核三

14 據當時在場的總統府機要室兼秘書室主任王家驊的說法：「吃完午餐後，大家沒事，就各自回各的房間。不久內勤侍衛官蔡福來打電話來說：『主任，您趕快上來一下。』上去之後，發現總統已經吐血了，第一次吐血。…隔一會兒，總統又想要吐，內勤侍衛官一邊拍他，結果吐出來的又是血。這次吐完之後，就當時的情形而言，似乎為時已晚。」見張力訪問，簡佳慧記錄，〈王家驊先生訪問紀錄〉，《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（上篇）》（台北：中研院近史所，2016），頁429-430。醫官姜洪霆也說：「中午一點半左右，經國先生突然嘔吐，內勤侍衛官用臉盆接住嘔吐物，我一看是咖啡色，就是胃出血的現象…接著，經國先生又連吐了幾次，突然喪失意識，姜必寧立刻指揮搶救，原本負責照顧夫人的護士也參與搶救，急救約兩個小時，孝勇同意放棄，姜必寧醫師才正式宣布死亡。」見沈懷玉訪問，林東環記錄，〈姜洪霆先生訪問紀錄〉，《蔣經國先生侍從與僚屬訪問紀錄（上篇）》，頁487。

發電廠的興建運轉、緊鑼密鼓的平行進展。

張憲義於 1967 年在陸軍理工學院物理系畢業，於 1969 年派往美國田納西大學攻讀核子工程碩士和博士，1976 年博士學成返台，進入桃園縣龍潭鄉中山科學研究院核能研究所工作，1984 年晉升為該所上校副所長。1988 年 1 月 9 日張憲義偕同全家人出國度假，1 月 12 日傳出滯美未歸，並由美國政府安排住在華府。1 月 13 日軍方認知張憲義「叛逃」¹⁵，已經洩漏蔣家核武計畫給美國，馬上報告罹患糖尿病、久病在床的蔣經國，我猜想這個威權獨裁者聞訊急怒攻心，當天吐血而亡。

張憲義阻止蔣家國民黨擁有原子彈，或許和我當年為了阻止蔣經國接班，並終止蔣家持有毀滅性原子武器的想法一樣¹⁶，我也認為，台灣人民不可能忍受蔣家父子與毛澤東互投原子彈！

事業與家庭

我在加州的私立大學念電子工程，1974 年又回到巴西念書，取得聖保羅州立大學電子、通訊工程碩士學位，並在聖保羅州立大學微波通訊博士班肄業。因為我是領全額獎學金的，所以當時

15 1988 年 1 月 12 日，中科院核能研究所副所長張憲義上校在美國中情局協助下出逃美國，證實中華民國研發核武的程度已踩到美國紅線，幾天之後即 1 月 17-18 日美方會同國際原子能總署突擊檢查核研所並拆卸設施、封閉實驗室。參見賀立維，《核彈 MIT：一個尚未結束的故事》（台北：我們出版，2015），頁 14。

16 此處尊重、保留受訪者的講法。事實上張憲義出走的動機比較複雜，參見主訪者即將出版的張憲義先生訪問記錄。

我一邊讀書，一邊幫學校做事，像是聖保羅州立大學物理系的核融合實驗室就是由我主持建造的。

1982 年我來美國依親之後，就住在洛杉磯，並代表史明在「美麗島週報社」當義工，我沒有寫稿，而是幫忙看稿、打雜，在那裡也認識胡忠信、陳芳明等編輯。1980 年許信良在洛杉磯創辦《美麗島週報》，1982 年與史明的「獨立台灣會」組成「台灣民族民主革命同盟」，所以當時史明也有幫《美麗島週報》出錢。美麗島週報社的成立，事實上與美國台獨運動團體之間的矛盾有關，當時聯盟的系統對史明很感冒，甚至罵他是「共產仔」。我一邊在咖啡廳打工，一邊在美麗島週報社幫忙，一年後就到加州理工學院（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）實驗室做研發工作，做了九年。

1988 年末，我在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（University of California, Los Angeles, UCLA）的台灣學生會上，遇到當時來美留學的陳正然、羅致政等人。陳正然在 UCLA 社會學博士班肄業，返台後於 1991 年因為獨台會案¹⁷被國民黨政府逮捕，大概幾個鐘頭後，日本、美國都接到了消息，當時美國的學生會有串聯抗議，包括 UCLA 的校長也有幫忙，至於史明的系統也有寄錢回來聲

17 1991 年 5 月 9 日，法務部調查局宣布偵破史明領導的台獨組織「獨立台灣會」在台的地下組織，逮捕該組織成員陳正然、廖偉程、王秀惠、林銀福等四人。由於其中廖偉程係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的研究生，而逮捕的行動是在沒有先知會校方的情形之下進行，使社會大眾產生情治單位對校園自主不尊重的感覺，因而引起了各方面的反彈。而以獨台會事件作為開端，促使了台灣反對運動進一步思考「懲治叛亂條例」與「刑法一百條」相關規定是否合乎憲法規範的問題。薛化元，《戰後台灣歷史閱覽》（台北：五南，2010），頁 387。

援。

賴文雄跟我很要好，1994年他還幫我介紹一個在桃園鋁業工廠的工作，那間工廠是他朋友開的，所以當時我曾短暫回台當廠長。

我的母親1982年左右就離開台灣，來美國定居，然後把台灣兩家日本料理店的生意交給我二哥和四哥經營。1994年我回台工作半年，但因為母親罹癌，便返回洛杉磯照顧她，直到1995年她過世。母親過世前後，我在洛杉磯一家雷射微距控制儀器公司工作，研發電腦和雷射結合的星座位置控制器，將安裝



王文宏先生與鄭自才(左一)、鄭紹良(左二)、黃文雄(中)、陳正然(右一)

在當時世界最大的智利安地列斯山七座天文望遠鏡 VLT，以便了解宇宙黑洞、大爆炸等理論。

1997年我到墨西哥邊境做電腦鍵盤的工廠做事，擔任 project manager。做了三年後，因為有一位在洛杉磯台灣人要到墨西哥市 (Mexico City) 做生意，我會西班牙文，透過朋友介紹，2000年我就在墨西哥市幫他做電腦週邊設備的生意。但墨西哥市屬於高海拔，我老闆和他兒子的身體都不適應，所以就把公司交給我經營，可以說他算是我的貴人。之後我又從美國進口電腦記憶體，因為墨西哥、哥倫比亞、委內瑞拉等國盜版猖獗，所以我也進口空白 CD 來賣，而且因為空白 CD 的生意做得不錯，鍊德光碟片還讓我代理。2004年空白 DVD 光碟片需求大增，我就到巴拿馬拓展事業，2010年增加太陽能系統和 LED 節能燈泡生意，這十幾年來在中南美的市場經商有成，以前還曾擔任過墨西哥台商會財務長、巴拿馬台商會副會長。

因為我是二二八受難家屬的關係，所以從李登輝時代開始，到陳水扁時代，我都有跟「美國二二八受難者家屬返鄉團」回台灣，這中間分別在2004年和2007年我擔任過兩次團長，行程包括拜會總統、行政院長、司法院長、僑務委員會等等。拜會阿扁總統時，我主要是提出轉型正義的訴求，我提到中正廟改為「台灣忠烈祠」來紀念護衛台灣而犧牲的英靈、撤走在桃園看管蔣家父子屍棺的警衛兵、改中正路名等等的事情，阿扁當時說這很困難，但他會盡量做。阿扁和我們說話時，非常親切。

我的太太是台灣人，我們1977年結婚，婚後育有兩個女兒。我的同志大部分離婚，可以說走上台獨這條路的人，家庭往往難以兼顧。我不敢說自己的犧牲有多大，因為別人的犧牲比我

還多。

我這次回台，主要是爲了和鄭紹良（1971年，鄭紹良擔任全美台獨聯盟主席）一起商量，引進有益台灣農業與生態的新科技，簡單說，就是利用原子活性炭，調整土壤結構。雖然我已年近70歲，可以退休了，但我自認身體還很硬朗，還可以做事，要是輕鬆度日，可能會衰老得很快。

我今後打算搬回台灣定居，我是學理工的，以前在加州理工學院實驗室做研發工作時，那些高科技的實驗，我都相當熟悉，工廠管理我也在行。此外，因爲我具有二二八受難家屬的身分，二二八是轉型正義的一環，所以如果有機會，轉型正義的相關工作，我也願意貢獻一己之力。

我在《刺蔣，鎮山》¹⁸這本書的結語，也就是我的人生寫照，與大家共勉：綜觀台灣獨立運動的志工，「歡喜做，甘願受」；爲了追求正義，大都妻離子散，生活溫飽難求。何其不幸生爲台灣人，世代爲外來政權統治！何其有幸生爲台灣人，爲熱愛台灣這塊土地，犧牲奉獻！



王文宏先生（右）於2016年5月2日在中研院近史所受訪

18 張欽泰，《刺蔣，鎮山：一位海外台獨運動者的行動與見聞》（台北：前衛，2016）。

